

拉弗曲线与现实应用评析

王 竹

“围绕拉弗曲线的很热闹的争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混乱的。”用美国著名财政学家哈维·S·罗森的这句评语点明本文写作的动因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拉弗曲线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著名曲线，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又最具争议的。整个80年代，拉弗曲线和它所代表的供应学派税收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哄动一时，引发了世界规模的税制改革和经济调整，其影响直至今日；但同时，对它理论价值和现实应用效果的评价却始终众说纷纭，毁誉之下难有定论。本文尝试从考察拉弗曲线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渊源出发，进而分析流行供应派对拉弗曲线的政策性解释，并结合美国税收改革实际，力图将围绕于拉弗曲线理论和现实应用的种种评价和争议理清头绪，并作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判断，最后就拉弗曲线对中国税制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等方面的启示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设想。

一、传统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的主旨在于说明税率、税收乃至总产出之间的辩证作用关系：当税率为零时，企业生产虽然因免税获取了最大化利润，

但税收为零，政府不可能存在，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税率为百分之百时，企业的全部收入上缴政府，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将因无利可图而停止，并为逃税转向物物交换经济，由于货币经济的中断，百分之百的税率下，政府收入却仍是零。拉弗曲线正是存在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当税率由低点上升时，税收也上升；到达某一点时，税收达到了顶点；税率由这一点继续上升便进入了阴影区，即过高的税率抑制了劳动、投资、储蓄等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下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较高的税率下反而得到较低的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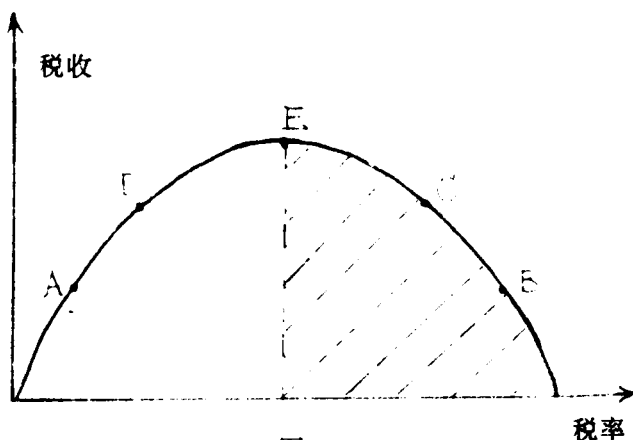


图 1

如图1所示：税率很高的B点和税率很

低的 A 点, 税收是一样的; 税率较高的 C 点与税率较低的 D 点, 又是一样的税收; 在 E 点, 税收达到了顶峰, 被称为“拉弗山顶”(E 点也被某些供应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是生产产出额与税收收入同时达到最优的一点, 也是选民自愿被课税的一点, 但这个结论是缺乏根据的, 对此的分析是本文评论拉弗曲线政策含义的一个重点), 阴影区被视为税收的禁区, 因为在这个区域提高税率不仅增加不了税收, 反而会使税收下降。

有关资料中还可以看到拉弗曲线的几种变形应用, 如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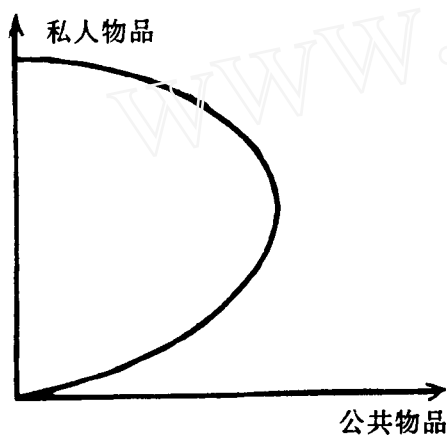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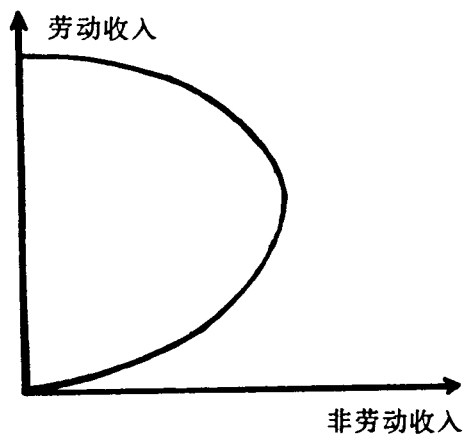


图 3

图 2 表明, 随着私人物品在总产出中比例的下降, 公共物品数量先增加后减少 (曲

线先向右下方滚动, 后向左下方滚动); 图 3 表明了类似的情况。虽然图 2、图 3 对拉弗曲线作了不同的解释, 但如果我们将政府税收的目的视为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进行收入的转移支付, 则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统一在对图 1 的分析之中。

作为一种理论工具, 拉弗曲线似乎具有独特的魅力。首先, 它创造性地进行了税率与税收之间的相关性考察, 用简明的抛物曲线形象地揭示出两者之间辩证作用的关系, 即“高税率未必带来高税收”, 而这一点以往往往被直观机械的思维所忽视; 其次, 它将税率视为影响总产出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认为税率变化导致的要素供给变化最终决定了总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 因而从微观经济因素的角度, 为宏观经济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再次, 它将抽象的经济原理引入了一个可以操作, 可以量化分析的领域。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创新之处, 但拉弗曲线所表述的经济学含义, 从诸多的前提假定到最终的结论却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事实上, 拉弗曲线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古典和新古典的理论传统, 而正是这种理论传统为拉弗曲线和它所代表的供应学派顺应时代形势, 融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之中, 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巨大影响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二、流行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

(一) 基本的观点

事实上, 无论是拉弗曲线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该曲线的一般性理论内含。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 拉弗曲线之所以成为“政策性曲线”, 供应学派成为美国的“官方经济学”, 主要的原因在于拉弗曲线的政策性含义, 本文称为“流行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

流行供应学派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供应学派,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上停步不前,他们基于拉弗曲线对美国经济现实作了激进的解释,所有的主张归结为一点:普遍而大量降低税负、特别是普降所得税税率,能有效地提高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同时政府收入不会大量减少。这样,他们为处于滞胀危机的美国经济预言了一个两全其美、完全乐观的前景。他们的观点在美国为广大选民所接受,成为里根竞选总统获胜的有力支柱,并最终成为整个80年代美国实施的主要经济政策,其影响广泛波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二) 减税政策的论据

7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美国尤其明显,对此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既无法解释又无法医治。而流行供应学派从拉弗曲线出发,将所有经济问题归结到一点:高税率(主要指高的边际税率)的危害。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的评论涉及到了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供应学派认为税收是抑制总产出的,体现在现实中,流行供应学派认为:

(1) 高税率妨碍工作努力。由于税率较高,人们实际收入下降,从边际的角度看,过高的累进税率使人们增加的收入被较高的税率征走,实际到手的收入很少。这样,改变了劳动对闲暇的相对价格,人们更多地选择闲暇,从而“旷工增加,加班减少,人们用于提高技术水平的时间减少。”

(2) 高税率妨碍投资和储蓄。税收会改变消费和投资、储蓄之间的相对价格,人们将收入现期消费得到的收益,相对于过高的边际税率下投资和储蓄获得的未来收益而言要合算,因而高税率是导致美国储蓄和投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3) 高税率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一方面,

高税率导致的劳动不足把大量妇女、临时工赶入劳动大军,这些非熟练劳动力远不如原来男性劳动力劳动效率高;另一方面,高税率使许多产品和劳务的成本及价格都受到较大影响,人们取得收入越多,损失越大,相反由于另一些产品和劳动不征税,如自我提供劳务,使得这两类产品 and 劳务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去购买而自己动手,而这些劳动如果由市场提供效率会高得多。因此高税率不仅损害生产力,而且还降低经济活动水平。

(4) 高税率导致地下经济活动和逃税盛行。过高的税率下,逃避纳税的行业吸引力增加,使大量资本和劳务流入那些不用纳税或能逃避纳税的地下经济,这导致了经济的紊乱和动荡,也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

基础于以上论述,拉弗曲线背后的总产出曲线似乎找到了充足的现实证据,流行供应学派由此断言,高税率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首要弊端。这样,减税以刺激和改善总供给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减税也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减税会大大刺激总供给,那么减税造成的总需求增加可以轻易地被抵消。

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必对减税造成政府收入的下降心存顾虑。因为美国当前的高税率被认为已进入了拉弗曲线的“税收禁区”,税率下降带来的税收下降会很快由于总产出的上升而得到弥补,政府实际收入能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

而在对拉弗曲线上E点的解释上,有些流行供应学派经济学家走到了极端,裘德·温尼斯基撰文称:“E点既是税收的最优点,也是产量的最优点。”这意味着,E点的存在能够使最优税收与最优产量自动统一,那么寻求最优产量的减税政策也就必然实现了最优税收。这样减税政策成为适用一切经济的万应灵药。

三、对流行供应学派的评论

如果说传统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实际表述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那么从这个理论基础出发,我们可以对流行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进行以下评论。

公允地说,流行供应学派将拉弗曲线与美国经济现实相联系,具有客观必然性,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美国经济确实存在总供给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方面过高的税率影响着生产要素的税后收益,对总产出起到抑制作用,而这个作用又由于当时经济存在高度的通货膨胀,高额累进税制下纳税人实际收入提高不多却要因名义收入提高过快超额纳税而进一步减小,这样,对一部分纳税人来说,确实存在税收进入拉弗曲线禁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过高的税负也使各种商品、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扭曲,如许多市场生产由于高税收的原因被家庭生产所取代,地下经济由于逃税带来的高收益而异常繁荣等等,这样流行供应学派基于拉弗曲线提出的减税政策也就有了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拉弗曲线在实际运用中也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简单复归,它实际体现了西方宏观经济控制“微观化”、“间接化”的新趋势。自凯恩斯革命以来,需求管理理论成为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思想,古典经济学提倡的“市场万能”、“供给决定需求”被凯恩斯的“政府万能”、“需求决定供给”所取代,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生活,依靠更高的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来创造更大的需求,希望以此实现低通胀、充分就业和高增长的经济目标。但自从70年代中期“滞胀”发作以后,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不再继续被证明万能有效了;而这时,源出古典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和流行供应学派使人们重新注意到了市场和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它认为决定供给水平的是微观经济因素,而市场通过竞争机制对微观经济因素的积极作用远比

政府的宏观政策直接而有效,所以,政府在总供给方面的宏观政策,应该是降低税率,取消各种对微观经济因素的束缚和对市场力量的限制,其结果必然是增加总供给,改善宏观经济控制的效果。当然,流行供应学派在运用拉弗曲线于美国经济实践时,也没有完全放弃通过政府开支调节总需求的政策,而事实上正是两者的综合运用,才达到了一定程度上摆脱“滞胀”的目标。

但我们也应看到,流行供应学派的理论也存在很多明显的缺陷。高度总量化的经济中生产要素供给弹性的不确定性使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并不稳固;过分强调税率又使其对众多的宏观经济变量缺乏考虑;而对E点的极端解释又体现了其理论推导内部的不严谨。所以仅就经济理论自身而言,它既不成熟,也不完善,只能作为解决具体经济问题而提出的特定方法。因而当流行供应学派的某些经济学家企图赋予拉弗曲线绝对的永恒的经济意义、极度夸张减税政策的万能效应时,就不得不在现实面前碰壁了。事实上,流行供应学派的一系列主张从来就没有完全地、彻底地、独立地实行,而它所许诺的美国经济的乐观前景也没有完全地实现,它在缓解美国经济滞胀危机的同时,也付出了高额赤字的沉重代价。

以上所讨论的流行供应学派运用拉弗曲线的成败得失将在下面结合美国税收改革的实践进行具体的分析。

四、拉弗曲线运用于美国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 里根的税收改革政策

里根是在供应学派的有力支持下竞选总统的,他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了供应学派的几乎所有主要观点。当选之后,他以此为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和改革税制举动。其改革过程依据目的和作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

(1) 1981—1985 年降低税率，改善税收制度结构。

里根执政后，立刻向国会提出减税计划，不久获通过，即为《1981 年经济复苏税法》，其要点是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 3 年内减少 25%，还规定 3 年后个人所得税的税级要随物价指数的变化加以调整；对企业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并简化手续，同时增加了对新机器设备的免税信用。这一次可以称得上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改革。

表 1 表示的是劳动所得边际税率减低的情况。在“经济复苏税法”下，一个只有 1 人工作的 4 口之家 1984 年的所得边际税率相对于实行 1980 年税法在所有收入档次上都有降低。

表 2 表示的是 1980 年和 1982 年相比较边际投资所得税率降低的情况。显然，“经济复苏税法”的实施降低了大部分投资所得的有效边际税率。

表 1 联邦边际所得税率
(1 人工作的 4 口之家) 单位：%

	1/2 中 等收入	中等 收入	2 倍中 等收入
在前税法下：			
1980 年所得税	18.0	24.0	43.0
社会保险税	6.1	6.1	0.0
总计	24.1	30.1	43.0
1984 年所得税	21.0	32.0	49.0
社会保险税	6.7	6.7	0.0
总计	27.7	38.7	49.0
在经济复苏税法下：			
1984 年所得税	16.0	25.0	38.0
社会保险税	7.0	7.0	0.0
总计	23.0	32.0	38.0

资料来源：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

表 2 美国投资所得综合边际税率 单位：%

	1980 年税率	1982 年税率
公司投资：		
设备	5.4	-4.0
结构	49.6	37.7
公共设施	33.2	32.6
仓储	35.6	35.6
土地	39.9	39.9
总计平均	34.5	30.0
非公司营业投资	35.8	32.7
所有者居住的房屋	18.6	18.6
投资总税率	22.8	26.4
资本总成本	7.0	6.8

资料来源：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

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说直接体现了流行供应学派的政策建议，期望以大规模的减税刺激总供给，治理滞胀，恢复经济。

(2) 1985—1989 年进一步的调整与修正，实行“收入中性”。

1986 年 10 月 22 日，里根签署实施了“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其主要内容有：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简化税级，降低税率，用 15%、28%、33% 3 个税级替代当时从 11—50% 的 14 个税级，这意味着美国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按 28% 税率纳税，大多数人属于 15% 的档次，同时 600 万低收入者免去了税收负担；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最高公司税率由 46% 减为 34%，但另一方面，由于折旧津贴将逐步降低，折旧年限有所减少，将资本收益视为普通收入征收所得税，实际上公司所得税率有了很大增加。

1986 年税制改革的意义不同于 1981 年经济复苏税法，实际上是对后者的总结和修正。1981 年税制改革大量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有效边际税率，但也带来税收大量减少，没有实现拉弗曲线的理论预期；1986 年税制改革则注意在税收总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各种税率的增减变化改善经济行为的分布，

具体做法是少量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小不同资产投资的有效边际税率差别,同时增加了公司所得有效税率。

(二) 减税政策的效果评析

虽然,在流行供应学派看来,拉弗曲线已经能解决美国经济的关键问题,而且也确实成了美国当时的主要经济纲领,但复杂的经济现实又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灵活地对待和运用这些理论建议,并且综合采用多种政策手段,包括货币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甚至一向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的种种作法。这样就为我们评估供应学派理论建议的实际实施效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我们仍力图利用美国 80 年代的有关经济数据对其作尽量中肯的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流行供应学派最为强调的微观经济因素在减税政策实施后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对总供给水平的影响。

表 3 生产要素相关数据变动表 单位: %

年份	失业率	就业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增长	私人储蓄增长率	私人投资增长率
1981	7.6	1.1	2.2	15.10	17.96
1982	9.7	-0.9	2.2	1.20	-13.23
1983	9.6	1.3	5.7	6.30	12.30
1984	7.5	4.1	5.5	13.70	32.35
1985	7.2	2.0	4.7	-1.2	-3.26
1986	7.0	2.3	3.2	0.63	2.54
1987	6.2	2.6	3.3	-1.10	6.08
1988	5.5	2.3	3.3	13.50	6.80
1989	5.3	2.2	2.5	3.73	3.23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8—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美〕《91 年度总统经济报告》。

表 3 显示了流行供应学派宣扬的在原过高税率下被严重抑制的各种总产出要素在减税政策实施后历年的变动情况,我们可以与前文对照逐项加以分析:

(1) 就业有了明显的增加。由于减税改

变了工作对 闲暇的相对价格,导致人们更多地从事工作,这一点上证实了供应学派的预想。如表 3 所示,80 年代,美国失业率基本保持了不断下降的趋势,从 1983—1989 年,就业增长率年平均达到 2.4%,高于 70 年代水平。其中,正如拉弗所指出的,劳动供给弹性较大的中小企业就业增长很快,从 1980—1988 年,共增加了 1750 万个工作岗位。

(2) 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虽然其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但减税对工人劳动量和劳动效率的刺激也有重要作用。如表 3 所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 3.6%,1983 年最高增长达 5.7%。

(3) 储蓄和投资率有一定增长。税率降低后,人们收入中消费比例降低,而储蓄比例得到增加。如表 3 所示:在 1981 年减税法和 1986 年减税法实行后,分别出现了 1983—1984 年,1987—1989 年的私人投资和储蓄的较大增长。

尽管表 3 中所列举的数据变化并不一定直接地、完全地反映出供应学派减税效应,但基本上符合了供应学派的理论预计,这样拉弗曲线背后总产出曲线得到了部分地证实。当然,数据中也存在不正常的波动,同时对数据的解释也可能因人而异,但对于减税政策对总供给的刺激,西方经济学界已有了基本一致的共识,争论只在于这种刺激作用究竟有多大,这说明供应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总供给增加导致的经济总量变化可以从下表得到部分地体现:

表 4 1981—1989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表 单位: %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经济									
增长	1.9	-2.5	3.6	6.8	3.4	2.8	3.4	3.9	3.1

资料来源:〔美〕《91 年度总统经济报告》。

表 4 显示,减税政策实施的年份经济增

长率都稳定地维持在较好的水平上,平均为3%左右。

另一方面,流行供应学派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也没有太大的偏差。

表5 1981—1989年美国消费物价年增长率

单位: %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消费物价 年增长率	10.3	6.2	3.2	4.3	3.6	2.0	3.6	4.1	4.8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8—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表5显示,从1981年开始,通货膨胀率开始逐年回落并保持在3—4%的可接受区间,尽管这个成就的取得与货币主义政策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至少说明了对流行供应学派的减税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指责不能完全成立。

综合表4与5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减税政策实施期间,美国经济基本走出滞胀的困境,那么拉弗曲线许下的另一个诺言:减税在促进总产出的同时,不会造成政府税收的大量减少,甚至有所增加是否也得到了兑现?

表6 1981—1989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

占 GNP 比重变动表										单位: %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赤字比重	2.6	4.1	6.3	5.0	5.4	4.8	3.5	2.9	2.6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88—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表6显示,从1981年开始,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里根1981—1985年第一阶段大规模减税改革实行期间,赤字占GNP的比重一直呈上升势头,这其中有关加性支出政策的影响效果,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收入的锐减(从1981—1984

年美国联邦赤字总额达5292亿美元,超过了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任期的赤字总额,而1985年仅一个财政年度赤字就高达2123亿美元);而在1986—1989年第二阶段税收改革期间,赤字占GN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主要由于通过提高公司所得边际税率和增加其它杂税收入使政府税收收入有所增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流行供应学派关于美国经济进入了拉弗曲线的税收禁区,减税对政府收入不会产生负影响的预言基本没有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减税的最终效果又是被供应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所注定的。既然“市场是万能的,税收是抑制总产出的”那么他们对减税不会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其实并不很重视,也未作严格论证,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他们的更主要目的在于减税会使总产出增加,这样美国的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在实践上导致了赤字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其利弊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经济现实表明流行供应学派基于拉弗曲线所作的两个主要预言一正一误,减税政策确实提高了总产出水平,但同时也造成了政府收入的下降。正是由于这一正一误,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80年代高经济增长、高财政赤字、低通货膨胀的经济格局。

五、拉弗曲线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一) 适用性的局限

在前文中对流行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所作的评论已经提到:拉弗曲线和它所代表的供应学派理论不过是针对具体经济问题提出的带有特定意义的解决方法,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是所有经济理论都共有的“时效性”与“相对性”所决定的。这一点不仅在拉弗曲线运用于西方经济中已经

得到体现,在研究其对具有极为特殊国情的中国经济的适用性问题上更应加以注意。

尽管流行供应学派宣传减税是适用一切经济的万应灵药,但中国经济现实决定了“拉弗曲线”应用的局限性:

首先,这是我国特殊的市场体制和政府职能所决定的。我国目前还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阶段,经济体制面临复杂的转轨问题:一方面市场调节尚不完善,存在各种经济信号失灵、失真的问题,需要政府的诸多干预和引导,另一方面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还未完全从计划经济中转变过来,存在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需要尽快促进市场发育、成长。由于我们与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完备的西方国家有着极大的差别,因而简单地模仿流行供应学派的作法,盲目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度夸大市场的作用只会使经济混乱失控。

其次,流行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以所得税税率为调节器,刺激总供给的微观经济因素。而我国目前税制与西方有很大差别,所得税还不是税收的主体。因此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照搬照抄都是毫无意义的。

从1984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一项题为《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的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传统供应学派意义上的拉弗曲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流行供应学派的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却是负面的或效果不明显的。

(二) 有益的启示

尽管存在以上种种现实性的局限,拉弗曲线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还是有可贵的借鉴之处的。

首先,拉弗曲线强调税收对经济调控的重要作用,税收政策的适当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政府收入,而且严重影响着经济中的相对价格。我们以前对课税效果很少作严谨周密的经济学分析,旧税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

公平竞争、中性、规范、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1994年颁布的新税法在这些方面作了重大的改进,包括简化工商税收项目,统一税政;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实现公平竞争;用增值税取代产品税,作到税收中性;统一个人所得税,使税负持平;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鼓励生产发展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原则上与流行供应学派所提倡的改革税制,刺激总供给的微观经济因素相一致的。而拉弗曲线所揭示的税率与税收额之间的辩证作用关系,也对我国税收改革目标模式:“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统一税种”,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其次,拉弗曲线也引导我们对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相互关系作深层次的思考。事实证明,一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微观经济要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是对经济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拉弗曲线提出的背景是在美国滞胀危机的时期,凯恩斯主义“政府万能”、“需求管理万能”的思想,导致了美国经济中政府过度干预了经济,宏观管理扼制了微观经济因素的活力,因此流行供应学派主张减税、松绑,将本来属于微观的、而被宏观扭曲了的东西归还给微观,也就是宏观管理采用“微观化”、“间接化”的新手段,从而使政府对社会经济总量的调节更有效。而我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对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还存在许多模糊的认识,一方面认为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还不能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是对经济不适当的干预。争议未息,经济中已经屡屡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迫切地要求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在搞活微观经济和完善宏观调控方面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责任编辑 王冰)